

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演讲·名家荟萃



[在文学馆听讲座]

明清小说

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线装书局

中国现代文学馆·公益演讲·名家荟萃



[在文学馆听讲座]

明清小说

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 傅光明主编.—北京:
线装书局,2007.12

ISBN 978-7-80106-743-2

I.明… II.傅… III.《红楼梦》研究 IV.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9020 号

明清小说——刘世德学术演讲录

名誉主编:陈建功

主 编:傅光明

责任编辑:于建平 杜 语

封面设计:野羊工作室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网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00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7年12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6000

定 价:29.80元



大学者刘世德(代序)

傅光明

近年来的“红学”热,带动了“读红”、“研红”者数量的激增。无法否认,这是客观效果的现实存在,但同时,也令众多的“读红”甚至“研红”者感到“红”乱如麻般的困惑,有的已在未知觉间陷入谜局。这么说,好像是标榜在谜局中我自独醒似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红楼梦》的读者,都可以是一个解谜者。不过,如何划定学术解谜与胡乱猜谜之间的界限,又是个颇费唇舌的事。《红楼梦》本身留下的谜毕竟太多了,导致解谜的视角多也属顺理成章,且解谜者多能自圆其说,以致有谁给挑个刺儿出来,便会媒体左右,网络上下,山鸣谷应,风起水涌。如此,在“红学”的江流里,似乎很难见“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了。

在“研红”的学者中,刘世德先生是方法、路径与众不同的一位,他从版本学的角度,以版本为切入点,不是单纯做版本之间的对勘,而是以此来探索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和艺术构思。这当然须以扎实、严谨、深湛的考据功夫作底子,非常人所能为也。

近年来,常见报道说某某破译、揭秘了“红楼”密码,喜欢弄噱头的媒体便趁势把“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对立起来,动辄就说某某的大作问世,即意味着“主流红学的全面破产”。好像主流红学家们早已经跑马圈地,霸道得眼里根本容不下嚼草根的;而“草根”又非要摆出跟“主



流红学”对簿公堂的架势,看你还敢强龙压地头蛇。

在刘先生眼里,其实不仅“红学”,任何一门学问都分两个层面,一是大众的,一是学术的,正好比学者与明星,本属两类物种,各有场域,倒不必非人为弄成隔绝甚至对立。现在的许多情形,是运用简单逻辑把大众与学术搅得水火不容,好像一提学术就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大众只能悄然而悲,肃然而恐;而一说大众,学界又嗤之以鼻,以为其只会拿猫脚功夫混饭吃,大可不必理会。于是,学者与明星的混搭横空出世,却也常弄到一种尴尬境地,学界似乎矜持得对明星并不感冒,而明星却晕乎得乱了方寸,攀比出场费的高下暂且不说,有的竟会演算出自我认定为明星加学者等于“部省级文化名人”的荒唐公式。

刘先生是板凳坐得几十年冷的大学者,但只要走近他,会发现他自甘寂寞的学术研究,不仅不会“冷”得拒你千里,且会从中自然流溢一种浓郁的亲和力。刘先生是有真功夫,有真学识的大学者,从不故弄玄虚,从不石破天惊。我想,这样的能力来自他天赋的学术才华。

想想能在近几年的时间里,通过邀请刘先生来文学馆做学术演讲,得以走近他和他的学术世界,实在是一份幸运。而带给我这一缘分的,是我的好友、《文学遗产》的竺青兄。当时请竺青兄帮忙策划,请学者们来文学馆“品读《水浒传》”,并请刘先生讲《〈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刘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才华、学术功力,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那份强烈的学术自信,深深感染着我。他的治学精神,研究方法,使我获益多多。还记得当我问刘先生是否愿意在文学馆已经讲过两轮《红楼梦》之后再讲“红”时(前两轮讲“红”,刘先生刚好不在北京),刘先生微笑着说:“我讲‘红’不用准备。”

他开始只准备讲四个题目,讲起来发现有的题目内容得两讲才容得下,便给我发来邮件,“申请”增加一讲。如此往来,最后一直增到七讲。再加上最近讲的“介绍一部新发现的《红楼梦》残抄本”,刚好以8讲“《红楼梦》之谜”单独成集。

刘先生所讲,多源自其学术著作《〈红楼梦〉版本探微》。竺青兄言,此书可以传世。我便向刘先生讨要,看后,以为然。同时,刘先生还一口气送了我他写的《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和《曹雪芹祖籍辨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证》。读罢,更由心底发出两个字:一为“叹”,二曰“服”。

说心里话,我虽然也忝列学界小有时日,做着令许多人羡慕的学术研究,但通过与刘先生的交往,才发现自己对学术二字,真是无从谈起呢!比如,在刘先生演讲“《红楼梦》后40回作者是谁?”之前,甬说别人,我都在心底问,难道这还有什么讲头儿吗?谁不知道《红楼梦》后40回的作者是高鹗,书上不白纸黑字印着?不是高鹗,那会是谁?你要说不是高鹗,得以理服人嘛。刘先生不紧不慢、有条有理地以坚实的考据功夫,一条一条地举证,有内证,有外证,使听者,也包括我,不仅不觉枯燥,而且被带入了一种情境,会觉得离真实越来越近了,直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实证的学问,不见得没有索隐出来的故事好听、有趣。大众不就爱听个“故事”吗?单以刘先生为例,他以如此深厚、令人叹服的版本功力,随时随地以文本为依据,实证地破谜、解疑,没有空穴来风,没有捕风捉影,而是透过一个个的细节线索,缜密地考稽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的变化,探索曹雪芹可能的写作方式。

刘先生以他令人叹佩的学术功力,每次都给听者带来学术惊喜。还是拿《红楼梦》来说事儿,对于普通读者,最熟悉的莫过于以悲剧收场的宝黛钗的爱情故事,特别是那些当年看过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受众,以为这就是《红楼梦》的全部。而且,有人根本搞不清,也不想搞清那么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像刘先生讲到的“迎春问题”,从不同的版本看,竟有七种说法,)而愿意干脆把宝玉和元、迎、探、惜四姐妹,都一股脑看成是贾政和王夫人的亲生儿女。这样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简单了。我小时候,脑子里灌的就是母亲以越剧《红楼梦》为蓝本讲的故事。到我读原著时,才发现里边的人物关系怎么这么乱!根本理不清,想想头都大。慢慢地,又发现《红楼梦》还有那么多复杂的版本问题,真乃中国古代小说中之唯一奇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先生讲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般的《红楼梦》读者所忽略的,并非不经意间地忽略,而是根本就注意不到。每次听刘先生演讲之前,我也常在云里雾里,觉得这个题目有那么多可说吗?每次听到最后,又都是云开月朗。



比如,刘先生讲的“两个贾琮”问题。一般读者能有多少人会对贾琮留下印象?贾琮何许人?他跟邢夫人什么关系?他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子,还是贾府的族人?刘先生以福尔摩斯式的“侦探”,结论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80回,实际上是由初稿和改稿两种成分组成的。在初稿中,贾琮不过是一般的族人。到了改稿,贾琮变成了贾琏的弟弟。由贾琮问题看出,标志着贾府败落的“抄检大观园”故事,是组成曹雪芹初稿的重要内容之一。换言之,《红楼梦》的素材包括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腐败、没落,一个是我们一般读者都熟知的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两者的合流,形成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红楼梦》的样子。

刘先生的学术自信,是建立在学术严谨之上。读《红学探索——刘世明论红楼梦》时,见书中收录了一封致冯其庸先生的信《关于曹良臣的几个问题》,信写得干脆利落,没有寒暄,一上来就直陈冯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考证曹良臣的籍贯问题、归葬地点和他的儿子问题,结论甚有说服力”。然后笔锋一转,便说在某处结论上资料还需“有所补充和修正”。再然后,就把自己以前读《明太祖实录》时抄下的相关记载附于后,有14条之多。再再然后,不动声色地说“上述材料,惟有第四条曾被大著征引。其余均在遗漏之列”。最后,刘先生又将自己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几点事实表述出来。不温不火,不急不躁,考而有据,严谨扎实,真一派大学者的学养风范。

何以能如此呢?在刘先生看来,“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必要向读者们郑重其事地提出和推荐呢?一个美好的推测,如果它不时地存在着被驳斥和被推翻的危险,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要苦苦地坚持和不断地重复呢?”

所以,他在从事曹雪芹祖籍问题的研究时,始终“努力以客观的证据为出发点、支撑点,并以带有浓烈的主观色彩的推测为忌”。他非常清楚,在没有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的情形下,任何主观的推测都带有冒险性。他说:“你企图让大家接受你的结论,然而你的结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却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你立论的基础既然是薄弱的,对大家来说,你的结论自然也就缺乏最起码的说服力了。如果从一开始起跑点就错了,



又怎么能够方向正确地、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终点呢？”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刘先生强调要有实证，他以为：“在考据中，在对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抉择时，如果只选取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排斥其他的多种可能性，那就必须以另外的证据为支柱。否则，严肃的考据工作就有可能变成一场随心所欲的游戏了。……我认为，一个公开提出的结论之站得住与否，最起码的检验的条件就是看它是否经受得起来自别人的任何有理由的反问。”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做考据，立新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证据。而证据是不能自封的。它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并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没有证据，考据就与儿戏无异，考据家也就沦为强词夺理的舌辩之徒。没有证据，新说就变成了臆说，并丧失了最起码的说服力。

“证据可以是多种的、多方面的。但以正面的、直接的证据为主，其他的都属于次要的、辅助性的证据。证据都以确凿可靠为前提。否则，将是软弱无力的、无助于解决疑难问题的。

“在立新说时，除了用正面的、直接的证据加以论证之外，还应当注意排斥反证。有反证存在，就说明新说的结论有着或大或小的缺陷。如缺陷过于重大，则会造成新的结论有被推翻的危险。”

邓绍基先生在为刘先生所著《曹雪芹祖籍辨证》所写序中说，刘先生的论文“注重实证，论析严密，即使有假设推论，也建筑在对文献材料作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万一材料不足，有的假设推论也注重情理逻辑，而不作无根无稽的和强词夺理的所谓‘推考’”。

跟随刘先生读过研究生、现在同样是知名学者的石昌渝先生，对刘先生身上体现出的“由郑振铎、何其芳所倡导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学风”深有感触，那就是“不盲从，不随大流，不尚空论，老老实实从大量可靠的材料中寻求事实的真相和文学发展的规律。这种学风看似平常，真正实践起来绝非容易，它需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更需要多一些的学术定性”。时下惯于拿故事戏说学术的浮躁学风，与此相差霄壤，利欲熏心者当警醒。在学术的付出上，一分功力带来一分收获，任何的假冒伪劣，都不会有学术生命力。

刘先生的“红楼梦之谜”，好似为由繁复的《红楼梦》版本问题而探索目迷五色的“红学”，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红楼梦》中的众多谜团不再“不见其处”，而是变得清晰了一些。“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我想，这正是刘先生的学术贡献，他的“版本学”为研读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和艺术构思，为研读其他明清小说，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新的可能性。读者尽可以充分享受由刘先生的版本研究所带来的阅读快感。“研红”对刘先生来说，是精微之处见功夫；“读红”对读者来说，是精微之处见滋味。简单一句话，刘先生的《红楼梦》版本研究，无疑有助于读者更清晰地“读红”、“解红”。

刘先生第一次莅临文学馆讲“水浒”的那天，是2003年10月11日，大雨。到2007年10月14日讲《红楼梦》的“眉盒藏本”，几乎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在文学馆做过16场学术演讲，并由此成为在文学馆演讲场次最多的学者。我不揣冒昧，戏称他为文学馆的“演讲冠军”。现在来看，这16场演讲像事先分割好了似的，讲《红楼梦》8场，讲其他几部明清小说（先后依次讲的是《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恰好也是8讲。这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部学术演讲录的源与缘。

刘先生不计尊幼，嘱晚学作序。唐突学步，聊以代之。

2007年10月12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文学馆听讲座]

目 录

《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001
《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021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	045
话说刘备	075
吴承恩与《西游记》	097
《金瓶梅》的作者之谜	129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157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189
后记	219



《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

演讲时间:2003年10月11日

刘世德:今天外边下这么大的雨,大家还赶来听我的讲演,我在这里首先对大家表示感谢。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水浒传》的作者和版本,这个题目比较枯燥。它是一个系列讲座的开幕式,精彩的主要是在后面,我这儿主要是抛砖引玉吧。我写了一个讲稿。有时候不得不念,不得不读,当然我尽可能脱离开讲稿来讲,这一点请大家原谅。我主要是讲《水浒传》的作者和版本。由作者还附带讲到了时代的问题,究竟《水浒传》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另外,我还要着重讲另外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创作下来的作品,还是一个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产物?准备在作者问题里着重讲这个问题。

现在就开始,先讲作者。作者和作品是分不开的,所以现在要从时代问题谈起。《水浒传》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作品?现在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看法。首先一种看法是明朝人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宋代的作品,这是个别的明代学者说的。当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学者接受这种看法。原因非常简单,虽然《水浒传》里写的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宋代,但那毕竟是北宋末年的事情。因此顶多说,如果它是宋代作品的话也是南宋的。但是这个话是没有根据的,是明代学者个别的人想当然地提出



来的看法。

第二种看法,认为《水浒传》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因此作者也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遵从的一种看法。第三种看法现在非常流行的,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产生的作品。这个系列讲座里有学者也持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基本上说服力还不是很够。他们无非是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是说,宋江这些人招安以后,大多数要么是杀掉了,要么是毒死了,要么是自杀了。这种事情只有在明代初年,朱元璋做了皇帝,大杀功臣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看法,它只是一种分析,并没有证据。

另外一点,为什么认为是明代中叶才有的呢?他说明代初年出现了一些水游戏,朱有燬写的。那个情节跟现在的《水浒传》不一样。如果说《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为什么朱有燬的杂剧里边写的水游戏会和《水浒传》不一样?所以加以怀疑。这种说法也只是一种怀疑,没有证据。再有一种说法是,这个书里面出现了一些明代的地名,因此它不可能是元末明初的人写的。还有一个说法是,这里出现了一些兵器,这些兵器根据记载是明代中叶才开始有的,明代中叶以前根本没有。再有一个说法,说《水浒传》里边写了大家是用银子,而在元末明初那个时候,在元代不用银子,用银子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所以,根据以上这几种情况,他们认为是明代中叶的。但是我觉得,第一,它没有提出证据。第二,银子也好,武器也好,明代的地名也好,是个别的情况。《水浒传》那么厚的一本书,里边出现了个别的一个名词,譬如说是明代的地名,你怎么能够不排除这是个别的人在后来修改时候加上去的呢?这么厚的一本书就那么一个证据,说服力不强。另外,有一些武器,有一些用银子的情况,固然是明代中叶以后才有,但这是根据一些明朝人的文字记载提出来的。我们知道一个情况,就是书面上的记载永远落后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如果说,现实生活里用了银子了,而书面上没有反映出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服力也不是很强。所以讲作者问题之前,我先要讲这个时代问题,也就是说,它还



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作者还是元末明初的人。这是我要先讲的第一点。

下面我就要直接讲《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了。《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从明朝到现在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罗贯中写的，就是说《水浒传》的作者是罗贯中，这是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有一些文人的笔记里面提到的，也是最早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合作的。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看法，也是明朝人的看法，不但见于明朝人的一些笔记，而且在一些明刊本上头，都是这么写的。每一部小说，第一页一定有作者是谁，这在明朝《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都是这样子的。它们这上头就写着：施耐庵，罗贯中。而且在一个书目的记载里边，还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的“的本”。“的本”是什么意思呢？“的”，就是确实实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原来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冒充的。“的本”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这个题名来看，《水浒传》它确实实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次”，“编次”的意思就是编辑，整理。从这个题名来看，《水浒传》应该主要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帮他整理、编辑而成的。所以说，如果是有两个作者的话，主要的是施耐庵，次要的是罗贯中。我是相信这个说法的。

第三种说法，是施耐庵一个人写的。这个最早也见于明朝人，但是时间比较晚，尤其是金圣叹那个本子流行以后，由于前面加了一个冒充的、施耐庵的序，那个序是假的，是金圣叹自己写的，那个文章很漂亮，句子也很流传，但那个是假的，和施耐庵没有任何关系。大家比较熟悉的，作者就变成了施耐庵一个人。

1949年开国以后，当时有一个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印古典小说，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印古典小说，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古典小说《水浒传》里就署的是施耐庵，所以现在大家普遍都知道，《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它有缺陷，就是把罗贯中给完全抹杀了。所以关于作者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施耐庵是主要作者，罗贯中是他的合作者。从狭义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承认《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从广义的方面来说，应该说《水浒传》是他们两



个人共同创作的。所以,第一,不能剥夺施耐庵的著作权;第二,不能抹杀罗贯中为《水浒传》付出的劳动。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我想就讲这几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可能有的同志会问:既然施耐庵是作者,那施耐庵是什么时代的人?什么地方的人?他的生平事迹又怎么样呢?非常遗憾,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现在一无所知。我们仅仅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他是浙江杭州人,当时叫做钱塘,最早的版本和最早的书目上都说钱塘施耐庵,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好像在今天的浙江省,不太重视这个问题,倒是别的地方老要抢施耐庵,把施耐庵认为是他们当地的。浙江杭州毫无动静,大概杭州名人太多,不在乎多一个施耐庵,少一个施耐庵。前一阵子,比较轰动的是江苏省,一个兴化,一个大丰,来抢施耐庵。这是怎么回事呢?兴化有一个施耐庵的墓,这个墓现在是文物。有的人说,既然他的墓在这里,那当然施耐庵是我们本地人。但是,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墓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建立的。当时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是民主政府,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那个县长姓李,是他建的墓。你想想看,上一个世纪40年代建的墓,这不能作为他的籍贯的凭证。这是兴化。我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何必非要和大丰来争施耐庵,你们这个墓现在就已经定为文物了,本身已经够了。另外,你兴化名人很多,郑板桥啊什么都是你们兴化的,何必去争一个施耐庵呢。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不怎么宣传这个事情了。

大丰是1949年以后新设立的一个县,以前没有这个县,由于历史上记载,传说施耐庵是白驹桥的人,这个白驹桥恰恰原来属于兴化,现在划归大丰了,所以现在他们在争这个。我曾经奉中央领导同志之命到大丰专门去调查这个事情,当地出现了施耐庵的家谱,还出现了地下挖出来的墓志铭,墓志铭上头那个人,有人说是施耐庵,有人说是他的后人,这些全是假的。那个家谱上耐庵两个字是旁边加上去的,墓志铭上出现的那个人名跟施耐庵毫无关系。所以也不可能是江苏大丰人,当然也不可能是江苏兴化人。我们现在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浙江杭州人,



ALAN... ..

INTERNATIONAL LIBRARY...

从前叫做钱塘。这是他的籍贯。他的生平事迹毫无所知。这个籍贯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水浒传》写到很多浙江的地名和现在的地理情况完全符合，他写别的省，什么山东、河南，很多地理他都是错乱的。由于作者知识有限，在封建社会，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他有些地理情况不熟悉，出现了错误。但是在浙江省杭州附近的地名没有错误。我在浙江大学有一个教授朋友，他跟我有通信关系，他给我的信封上总是写着：道古桥某某寄，而我在《水浒传》里发现了有道古桥这个地名。就是这么一个小地名，《水浒传》上都有，说明他对浙江对杭州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说他是钱塘人是很可信的。

那他是什么时代人？当然是明代以前的。我们为什么断定他是元末明初人呢？那是因为由他的合作者可以确定。他的合作者就是罗贯中，而罗贯中在《续录鬼簿》里有小传，根据这个小传来判断，他是元末明初人。合作者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当然也是元末明初人，作者和时代是这么确定下来的。但是只知道他姓施，他的名字并不叫耐庵，耐庵不是字就是号，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提出一种看法供大家参考，还不能够说它是百分之百的证据能够成立，只是供大家参考。就是说，施耐庵有可能是施惠，施惠是元末明初的一个戏剧家，写南戏的。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曲学大师吴梅，吴梅在他的《顾曲麈谈》这本书里边说，施耐庵就是施惠，就是南曲《拜月亭》的作者。可是他没有说出他的根据，大家很长一个时期引用吴梅的这句话都要加上一句：不知道他是根据的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抄本，叫做《传奇汇考标目》，这是跟《录鬼簿》什么的相同的一个作品，列举了戏剧家和戏剧作品。《传奇汇考标目》当中，就写了施耐庵叫施惠，是《拜月亭》的作者。吴梅的根据就在这儿。再往后，吴梅又发现了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本书，叫《三家村老委谈》，这里面讲施耐庵就是施惠。我可以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大家去思考。在《续录鬼簿》上我们找到了施惠，根据《续录鬼簿》的介绍，施惠是杭州人，大眼睛，胡子很长，很漂亮，写戏曲的。关于施惠，就是这么个情况。施耐庵除了以上讲的以外，现在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其他的正面的、肯定的、



确凿无疑的证据和记载。作者问题大致就是这样。

下面就提出一个问题：《水浒传》是不是作家的创作？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能不能够成立，我也没有公开写专门的文章来谈。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一些著名的、第一流的，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累积型的集体创作。什么叫累积型呢？就是说这些作品，从宋代、元代到明代都有很多人写了这些东西，是逐渐积累下来的。这个话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它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累积型无非是说这个作品它是用素材作依据的，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想，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有素材的，都是在素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另外甲素材、乙素材、丙素材、丁素材加在一起并不等于《水浒传》。这个理由很简单，我们有好多布料，这一块，那一块，这些布料加起来，并不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从布料到衣服，当中有一个必经的程序，一定要经过裁缝的巧手，没有裁缝，你这些布料没办法做成衣服。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恰恰是起了一个裁缝的作用。但是他不是工匠，他是有创造性的大师，不是一般的裁缝。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我将要举例子。光是这样子只是一种推测，只是一种空谈。必须得举例子来加以说明，才能有说服力。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一个例子是林冲，一个例子是宋江杀阎婆惜。我先讲林冲，我们知道林冲在《水浒传》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出场最早，除了鲁智深以外，他是最早的。另外，《水浒传》这部书描写的是“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在梁山的英雄身上，谁体现的最充分、最准确呢？林冲。林冲的故事最充分、最准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在《水浒传》以前的、所有的文字资料当中，这些文字资料包括文学性的、非文学性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只有林冲的名字，没有林冲的故事，更没有现在《水浒传》里写的他这些故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水浒传》里林冲的故事是作家施耐庵创作的，我们找不出以前素材的依据。如果大家能够举出一下材料，说以前写过林冲的故事，这个是有依据



的,我这个说法可以被推翻。如果大家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出来,我这个说法恐怕就有一定的说服力了。这是我举的第一个例子,关于林冲的。

第二个例子,关于宋江和阎婆惜的情节。这跟林冲的故事有点不一样。林冲的故事,可以说我们在林冲的人物形象,林冲的故事情节上头,我们看不到累积,看不到集体创作的影子。但是在宋江杀阎婆惜上头,我们要承认,它有累积。我接着要说的就是,这些素材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水浒传》,它有什么区别?这些区别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区别?如果是量的区别,我们就得承认是累积型的作品,起码在宋江这个故事上;如果是质的区别,那我们就要思考了,这不是作家依据以前的东西写出来的,而是他动了脑子,花费了创造性的劳动写出来的。第二个例子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宋江杀阎婆惜,这个情节在《水浒传》里是第二十一回和第二十二回,写得非常精彩,用白描的手法,有非常仔细和细致的刻画。我们知道,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水浒传》也好,对于生活场面的描写是很少的。我们看《三国志演义》很少看到,夫妻两个人在家里吃饭、喝酒、互相谈话,没有。《西游记》里也没有这种日常生活的描写。而关于阎婆惜和宋江,就有这方面的描写,尤其是日常起居生活,房间里的布置。大家去看《水浒传》,写得非常具体,这和其他地方还不一样,这表明了作者的手法很高明,艺术性很高的。二十一回和二十二回写宋江,很详尽地写出来宋江的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忍气吞声,从忍气吞声发展到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再发展到怒火中烧,怒火中烧再发展到手起刀落,就把阎婆惜杀了。这个过程写得非常详细,而且很合理,我们感觉到非常合理,不是作者硬加给我们的,就好像生活一样的,符合生活逻辑发展,那是写得很成功的。

另外,阎婆惜这个人物也写得很成功,非常狠毒,而且是得寸进尺。另外,还写了一个小人物,阎婆惜的妈妈,一个小老太,也是非常生动的,既狡猾又很平凡的一个人物,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构成非常的好。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并不好,可是勉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一個关